

从文学的他国化看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

杨颖育

(四川师范大学 外事处, 成都 610068)

摘要: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从兴起到繁盛对民族(国别)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然而, 翻译文学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从被视为外国文学到呼吁纳入民族文学的范畴, 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问题饱受争议。从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出发, 结合文学意义的生成方式、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等层面来看, 翻译文学有中介性和独立性两大特点, 应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关键词: 翻译文学; 文学的他国化; 中介性; 独立性; 学科归属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11)06-0120-05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存在形式, 在各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项活动”^{[1]247}, 翻译承载了文化交流的特殊使命。翻译文学的兴盛与发展, 折射了跨时空、跨语言、跨文明的世界文学的精神本质, 传递了外国文学最富感染力的语言、人物形象、情节、意象、思想主题等异国情调, 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增添了异质的营养。然而, 翻译文学的地位却一直被边缘化, 如何对翻译作品进行定位、翻译文学史的撰写以及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等问题不容回避。目前, 中国学界对翻译文学的定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2]47-49}; 另一种观点认为, 翻译文学属于译语民族(中国)文学^{[3]126-139}。从世界范围来看, “尽管文化史学家普遍承认翻译在民族文化的构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目前此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贫乏, 文学史家在无法回避时才谈到翻译, 例如在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 “但都很难阐释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体系中的作用或者在那个文学中所处的位置”^{[4]115-123}。本文从文学他国化

的研究出发, 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做描述性分析, 并对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进行探讨。

一 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考辨

1.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

季羨林先生将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诞生, 成长, 繁荣, 衰竭, 消逝。他认为, “中华文明这条河流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 得益于大大小小的新水注入, 最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 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 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5]210}。翻译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两度辉煌, 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汉魏时期的佛经翻译为开端, 促生了变文、弹词等说唱文学, 对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晚清民初时期, 在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下, “林译小说”等“豪杰译”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过程中问世, 直接推动了小说、政治、社会、科学等著作大量译介, 对新文学运动的

收稿日期: 2011-07-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编号: 11YJC740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颖育(1972—), 女, 四川成都人, 四川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教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比较文学。

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蝶化于民族文学,二者之间具有客观、不容否认的密切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前者是后者的变异,即他国化的产物,二者均具有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艾斯卡皮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6]¹³⁹描写翻译学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实,是一种文化间的传输现象,这一文化事实应该置于更高层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既须考虑到整个文本和行为的方式,并留意其文化背景,同时翻译原则与策略的选取,对于目标语系统内的文化建构以及源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均有着很大决定作用。尽管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联系紧密,但是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首先,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中,两种不同文化的遇合际会,必然经历碰撞、协商、消解、妥协、接受等等过程。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经过解读、价值评判、改造、变通等文化协商的结果——译作,已不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7]²。其次,文学翻译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只是文学翻译的外在行为方式,其本质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而译者在翻译再创造中,除了相对忠实地传达原著的基本信息之外,还要在其艺术性、审美性等方面下功夫,可以说,基本信息和艺术审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8]⁵⁸翻译家的审美观念对翻译文学形态的生成与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审美观念,作为审美意识的客体形式,它是审美经验积累、归纳和概括而成的观念形态。它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功能目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其它社会理性观念相联系,同时受特定的文化心理、社会实践要求的制约。审美观念对具体的艺术创作活动起着规范作用。“翻译家的审美观念所决定的审美理解直接关涉到他对译语本文的形式结构的价值判断。由此,翻译形态差异性便呈现出来”^[9]⁴⁷。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译者的主体性,造就了原作在转化过程中差异的形成,任何简单的划分都是轻率而不客观的,因此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

2. 翻译文学与民族(中国)文学

翻译伦理研究表明,译者并非不想忠实地翻译原文,因为在他心目中时刻都有一个“我必须忠实原文”这样的理念在召唤他。然而事与愿违,随着译者

笔走龙蛇地译下去,不觉间意念中“那箭头却越来越偏离轨迹,并最终失去了靶心”^[10]¹²⁴,导致译者背叛原文和译者背叛自己翻译初衷的原因,就是翻译转换过程中的语言变换、接受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和译者自身的文学、审美素养等方面的综合作用。经过了译者再创造的翻译文学,其性质和地位如何界定呢?米勒曾用一个隐喻来阐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翻译实际上是另一种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文本,这种文本将是嫁接在原文之上,并从原文那里获得生命;同时它又有别于原文,正如嫁接的树枝区别于从根部长出的树木一样”^[11]¹²⁴⁻¹²⁵。翻译文学是用民族文学语言创造的产品,也迎合了民族文学的某种特定需要,但仍是长在原文树木上的新枝,具有双重身份和属性,并不是纯粹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要经历理解(interpreting)和表达(representation)两个过程,“无论诗人从哪一个世界提取他的创作内容,无论他的主人公们属于哪一个国家,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12]⁷⁷。翻译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也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原作,并按下他的印记的。翻译文学必然受到民族(国别)文学话语的意义生成和表达方式的影响,文学的他国化的阶段,往往是打着译介外国文学之名,行改造影响民族文学之实。

鉴于其中介的性质,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参与了民族文学的建构和发展,对民族文学有深刻的影响,是民族文学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民族文学。其一,从题材的选择、内容的表达上看,外国文学的译介往往着眼于本民族的需要。如鲁迅介绍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是因为他们的境遇“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可以起到唤醒中华民族的作用,但是其题材毕竟是俄国革命;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反映到中国读者脑海里的还是欧洲宫廷故事。其二,从文学的载体来说,尽管“语言是文学民族性的第一标志”^[13]⁴⁶⁻⁴⁷,但是,在异域土壤“嫁接”中生成翻译文学,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翻译腔”、“欧化句”、“被动句”等,不管是否愿意,都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异国因子。还有大量异国情调的文学形象,西方文学、宗教的思想内容,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等,丰富了民族文学。但是这些新的言说方式带来的新的意象、理念,以及新的文学主题、

叙事风格等等,都不同于民族文学中固有的文学因子。最后,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原创性,这种原创价值体现在作品题旨的确立、作品整体结构安排、作品情节的编制、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译者对此并没有付出多少实质性的劳动。

二 外国文学的他国化

“文学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异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表现在传播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化——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异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就是指对这种现象的研究。”^{[14][147]} 翻译文学的本质是主客体同样运作下思想的双语意义转换和形式转换,外国文学的他国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常态,翻译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中介质,一方面,对外国文学的传播以及外国文学在目的语中的文学经典化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的他国化对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建构的现成定势和标准加以复杂化。按照文化的运作规律,任何文化都会不时地与异质文化发生接触、碰撞和交流,如果没有异质文化的刺激和滋养,这种文化到一定时期必然会走向萎缩和衰亡。所以,翻译文学的起点是外国文学,终点是民族文学,翻译文学是各国文学交流中的介质,绝对的交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是翻译文学的特质。

由于传播国和接受国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接收者必然根据自身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对外来因素进行重新改造与重新解读和利用,一切外来文化都是被本土文化过滤后而发挥作用的”^{[15]96}。佛教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正是外国文学的他国化在接受—改造—新生这过程中的典型例证。

在佛教的传播之初,佛教在当时社会处于很高的地位,阐释者对佛经采取了亦步亦趋的翻译策略,这是因为当时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其“充分性(adequacy)”,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然而佛教的主要受众是广大民众,佛经的内容和传统汉文化有巨大差异,为了消除原文陌生感,方便读者阅读与理解,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求,佛教传播者借用了传统汉文化中

的许多观念和术语来“格”佛经之“义”。译经者放弃了文言,而采用了与上述各项条件相适应的通俗口语来译写佛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文体,即汉语文言文之后最早的白话文——佛经文学用语。这时,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discrepancy),体现译文的“接受性”(acceptancy)和流畅性(fluency),译者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的,即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再如,马克思主义并不源出于中国和东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由翻译而来,当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进入汉语世界,寻找到相应的语言形式作为它恰当的物质载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迈上了“中国化”的步伐。从对概念的理解和诠释上来看,西语符号在转换为汉源词汇的过程中,鉴于汉字的多义性,势必赋注了一些汉字本身固有而西文原意并不包含的意义,这在客观上完成了符号转换过程中的语义诠释的中国化。例如“民主”这一词汇,在儒家经典《尚书》中就已经存在,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代表性术语,与西文原词“democracy”在含义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致使本来在西方作为一种行政和决策程序的“democracy”随着符号的转化而产生了意义转化。如今中国民众所理解的“民主”,仍然渗透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理解^{[16]34}。由于语言符号的转化与目的语国的文化实践结合而产生了意义和实践层面的他国化(本土化)效应,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他国化的结果。正如米勒所言:不管理论在新的语言中如何被仔细地、忠实地翻译,它在某种程度上遭遇的扭曲总是难免的,“来自一个语言、文化脉络的理论家在被译入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时,有些成分得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转变,衍生新意”^{[17]2}。

三 翻译文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当代译学研究成果表明:由于译者受制于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他们必然不可能忠实地翻译原文,故而所有的译文都是对原作的重写^{[18]9}。因此,翻译与作品之间至少在两方面互有关联;其一,选择原文的原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跟译语文学的本国“并存系统”(co-systems)相关;其二,翻译作品采取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简单地说,即“文学形式库”(literary repertoire)的应用——必定跟其它的本国并存系统息息相关。这些关系并不局限在语

言的层面上,还在时代对翻译文学的选择等多重层面上显示出来^{[4]117}。因此,翻译文学可能有自己的文学形式库,甚至有颇为独特的文学形式库。动态地来看,翻译学科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1. 主题选择的独立

“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19]99}。翻译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是以目的语国的时代文学主题为主旨的^{[7]9},翻译文学不但受到时代历史社会背景的影响,还直接参与到了时代文学主题的构建当中。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危亡的时代意识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取向,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和苏联文学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价值取向,并影响了以后的文学翻译择取,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基本走向和特征。文学翻译的选择与时代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对辛克莱译介的巨大热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辛克莱克的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其文学声誉在美国并不是很高,之所以在中国红色的30年代获得了这样高的文学地位,还是因为其作品中的革命话语契合了中国时代的需求,被认为表现了“时代精神”^{[7]8}。因此,从中外文学翻译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发现特定时期翻译文学形态与当下的译语民族文化哲学思潮、审美风尚和读者接受水平密切关联。也就是说,翻译文学主题选择,并不一定和外国文学的时代主题一致,其审美标准也因接受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有别于源语国经典的译本主题选择的独立性。换言之,并非外国文学中的经典都会被同步译介、对外国文学的解读和接受也是独立的,如格列夫游记的儿童文学化。

2. 翻译文学的中介性

翻译文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以及译者和读者对他国文化的态度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歌德曾经说过:“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最能表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解放他自身的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在对作品的再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20]80}。在这种纯语言中,一切信息,一切意义,一切意念,最终都在统一语言层遭遇,并注定在这里消亡。翻译永远指向这种具有中介表述(intermediary representation)性质的纯

语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兴起,正是在时代对于另一种文化的深切渴求,以及对另一种文明发展的认识的渴望下产生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人们常常说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指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历时性地构成同步对应关系。由于翻译文学史的独特性质,翻译文学史实际上也同时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文学接受史^{[21]19}。因此,译作与创作相容而共生,异质而同构,翻译文学以独特的文学面貌,融入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与创作文学一起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空间,它们理应在民族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可以说,翻译文学的中介性在于翻译文学的变化性。以语言为介质,以文学为媒介,翻译文学的作用就在于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

3. 翻译文学身份的跨越性

翻译文学具有跨语言、跨文明、跨时空的特点,翻译的跨越性特点和极强的文学性决定了翻译文学界定和定位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度。例如:中国大学的中文系里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其实是翻译文学课,外国文学课程开设在外语系,翻译学科隶属于比较文学,翻译专业又设在外语系。不同学科之间的频繁交叉使人们对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ity)和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逐渐成为知识构成的显著特征,从整体论(holism)来看,任何一个理论、概念、隐喻、主题,不管是物质实体、社会现象,还是生态系统,都暗示出一种整体性,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难以对其进行充分的阐释。整体思维使系统研究优于局部分析,学科互涉使文学研究更趋立体化。从文学的整体性来看,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是翻译文学这枚硬币的两面,它属于外国文学,因为它的源头和大量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情感、思想主题、叙事策略来自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属于国别(中国)文学,因为在外国文学翻译接受过程中,文本经历了选择,文化经历了过滤,意识形态参与了文本的改写与接受,读者视野的期待劫持了译者,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认知以及文学审美参与了翻译的共谋,外国文学文本在他国化的漫漫征途中参与了民族文学的构建,是外国文学“不能承受之轻”,也是民族文学“难以舍弃之重”。外国文学和民族文

学是翻译文学这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交流之河的此岸和彼岸,唇齿相依,它时时的泛滥,又给民族文学带来无尽的异质营养,裹挟着世界文学的潮流奔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人类的文明在此交汇繁衍,生生不息。

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成为了将翻译文学纳入民族文学的理论依据,然而对于翻译文学地位的争论难以画上句号,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为翻译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找寻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定位成为解决问题的

关键。翻译文学的他国化理论结合了接受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传播者的个人审美倾向等众多因素,为动态探讨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开辟了新视角。简单、轻率地把翻译文学划分到外国文学或是民族文学,难以客观、科学全面地描述翻译文学在文学交流变迁中的历史真相,也无法还原翻译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身份,更不利于翻译文学的持续发展。只有进一步加强翻译文学的系统研究,保持翻译文学的学科相对独立性,同时关注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翻译研究、文学史等学科的互涉,才能更好地认识翻译文学、发展翻译文学。

参考文献:

- [1] Richards, I. A. .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lating" [C]// Arthur F. Wright ed. .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 [2] 刘耘华. 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J]. 外国语, 1997, (2).
- [3]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3.
- [4] 埃文-佐哈尔, 伊塔马.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C]. 庄柔玉译//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5] 季羨林, 许钧.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J]. 译林, 1998, (4).
- [6] 罗贝尔·艾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王美华, 于沛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 [7] 谢天振, 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8] 张友谊. 翻译文学归属之研究——“不等边三角形”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6, (5).
- [9] 彭甄. 翻译文学形态的历史类型研究[J]. 国外文学, 1999, (2).
- [10] J. Hillis Miller. "Translation as the Double Production of Texts" [C]// Claire Kramsch & Sally McConnell eds. *Text and Contex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tudy*. Ginet Lexington & Toronto: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2.
- [11] (转引自)张旭. 跨越边界: 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2] 别列金娜(编). 别林斯基论文学[M]. 梁真译.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8.
- [13] 张铁夫. 翻译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J]. 理论与创作, 1990, (5).
- [14] 曹顺庆. 比较文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5] 乐黛云, 等.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6] 张允熠, 张弛.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J]. 学术界, 2007, (6).
- [17] 单德兴. 翻译与脉络[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18]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9] 麦克昂. 桌子的跳舞[M]. 郭沫若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 [20]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21] 谢天振. 中国翻译文学史: 实践与理论[J]. 中国比较文学, 1998, (2).

[责任编辑: 唐 普]